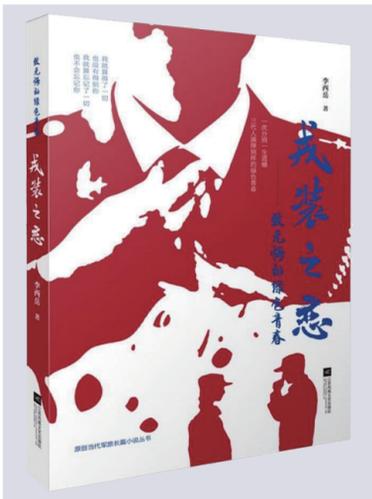


《戎装之恋》： 让英雄形象留下时代的精神记忆

□李西岳

搞军事文学创作，离不开塑造英雄形象，如何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这一个”英雄形象，一直是军旅作家所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困扰的难题，因为古今中外的军事文学名著，几乎什么样的英雄形象都有人写过了，想标新立异，横空出世杀出一个全新面孔的“程咬金”，不是那么容易。说实话，我是从事军事文学创作的后来者，之前，前辈们把形形色色的英雄形象都写绝了，我只有绕着走，绕着走的做法是着力写英雄的婚恋生活和情感世界，在儿女情长的纠结中再现英雄的顶天立地。比如《百草山》中的贺金柱，打起仗来英勇无比，却因为一个离婚事件，造成了一辈子的尴尬和悲情。再比如《血地》中的李长生，参加革命暴动后离家出走，当上红军团长，回来却发现自己的爱人变成了弟媳，他一边带领群众打鬼子，一边接受感情的煎熬……英雄也是普通人，只不过是特定的时空中完成了英雄使命，他们有着普通人的情感，而正因为称为英雄，他们的情感生活就更多受到道德的严格约束和和平时期的精神境遇都留下了强烈的时代精神记忆。

《戎装之恋》是我的第5部长篇小说，刚刚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小说主要写了一家三代军人的婚恋生活。第一代父亲是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参加红军游击队之前家里有了童养媳，为了逃婚，15岁的父亲偷了家里八块现大洋投身革命。抗战爆发后，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东进抗日，父亲在前线得到全家被“白狗子”斩尽杀绝、房屋烧毁的消息，解放战争攻打苏州，父亲救了被保长逼婚的大丫，大丫立誓非父亲不嫁，父亲被动接受，答应战后结婚，大丫却在淮海战役中支前牺牲。在朝鲜，已当上师长的父亲看上了文工团漂亮演员高娜，结果高娜却以与文工团团长相爱



为由拒绝，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娶女军医杨春丽为妻。戎马一生官至大军区副司令的父亲，最遗憾的是没有娶到漂亮演员，他就把这一理想寄托在唯一的儿子“我”的身上。“我”是平时时期边境作战的英雄，当指导员时，与驻地女教师林红产生恋情难舍难分，父亲得知后把“我”强行调离，并下令“我”与林红断绝关系，“我”不敢抗旨违心与林分手，并在父亲的撮合下与军区文工团漂亮舞蹈演员朱倩结婚，然而却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儿子军校毕业后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按照父亲的要求，全家人无论婚嫁都要找军人，“我”的两个妹妹都是按照父亲的标准找的军人，可叛逆的儿子却与大他一岁的外地打工妹热恋并准备谈婚论嫁，“我”和朱倩认为是大逆不道而强行干涉，儿子留下纸条离家出走……隔辈父亲的父亲却对“我”说：“当初我没给你自由，你就放他一马吧。”

动笔写《戎装之恋》之前，我就暗暗对自己说，千万不能重复自己，不能把自己的东西从左边兜儿里掏出来，再放在右边兜儿里，糊弄自己等于自欺欺人，哪怕往前走一小步，也是进步。说实话，在作家队伍中，我的写作节奏并不快，不大勤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想扎扎实实地走一步是一步，不盲目追求数量，所以这部《戎装之恋》我反复酝酿，几次颠覆，煞费苦心。我认为，这部作品就思想意义而言，我写了两代军人的忏悔，他们的人生旅途中都有精神的负疚和心灵的煎熬。当父亲得知当年的童养媳不仅活着，而且还为他生下一子的消息后，便带着全家踏上寻亲之路，当童养媳把记载他离家数日的豆子撒满一地时，父亲老泪纵横地带领全家人齐刷刷跪下。“我”因迫于父亲的压力违心与心爱的林红分手，可一生难以忘却初恋时的点点滴滴，当得知林红为等自己多年子然一身时而捶胸顿足追悔莫及。在叙述方式上，我采取了“游走式”结构，主人公“我”去寻找离家出走的儿子，在车站偶遇前来看他的林红，他们结伴一路行走，走到一地，就牵扯出新的人物和故事，一直走到父亲的老家信阳，也是“我”插队的地方，最终作品完成了两代人的忏悔诉说及道德救赎的使命，这样的结构是受英国作家乔伊斯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朝圣》的影响，主人公得知人得了绝症，便独自踏上探寻之路，不是开车，也不是坐车、乘飞机，而是步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显出他的关心和诚意。他认为，只要自己一直在走，一直在寻找，病友就会活着。“游走式”结构颠覆了我以往的线型叙述和板块样式，时空随着“游走”而转换，人物和故事也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而叙事的精神平台不变，

这就使作品读起来轻松而清新，跳跃而灵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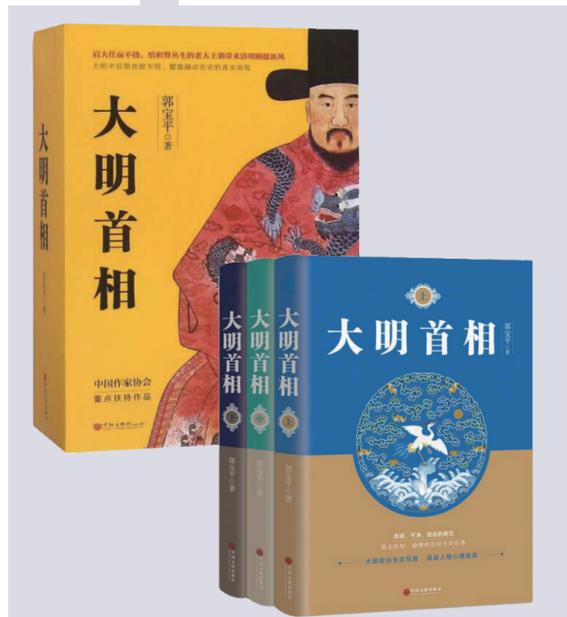
这部小说，我大概构思了20来年，刚开始想表达什么东西不是很清楚，也就没急于动笔，后来我慢慢悟出，军人的牺牲是什么？是军人生命的全部，这里包括自然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情感生命等等，一旦你穿上这身军装，就把你的全部都交给了祖国，交给了人民，交给了使命，交给了战争与和平，你随时都要做出全部的牺牲，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写三代军人的婚恋，实际上是写三代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在写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军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在近百年的风云历史中的使命担当、牺牲奉献和情感悲欢。幸福的家庭基本相似，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军人家庭也不例外，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去履行军人的使命，并不影响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冲锋陷阵。父亲如此，我辈如此，儿子如此，世世代代都是如此。这就是中国革命军人的特质。

英雄的成长离不开他所处的生活环境，离不开他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以，他们的英雄行为和心路历程都会留下强烈的时代精神记忆，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里，高大全式的英雄不复存在，食人间烟火的英雄都会有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一面，爱江山也爱美人的英雄同样可尊敬、可亲可爱，然而，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军人却为了服从天职和崇高使命，无谓地牺牲了爱情，或者委曲求全地选择了婚姻，这是常人难以体会得到的。所以，我们在塑造英雄形象时，或者写普通军人生活时，不仅要看到他们外表的光鲜和洒脱，也要看到他们内心的纠结和无奈，用掰开揉碎的方法，去解剖和撕咬他们的心灵，一斧凿开他们冰冻的心海，让读者走近真实可敬却并不完美完美的他们。

郭宝平《大明首相》

对历史负责，让人性闪光

□徐峙



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创作，架空、穿越、宫斗等类型的作品大行其道，严肃的历史小说几乎被边缘化。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郭宝平长篇历史小说《大明首相》，则是一部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的作品。这部小说以16世纪世界历史转折点和明末大变局为背景，通过对隆庆年间内阁首席大学士高拱的描写，映照了大航海时代古老中国的华丽一跃，记录了大失败前夜力挽狂澜的奋力一搏，捕捉了厚黑学盛行时代追求公正的一抹亮光。

历史小说必须有历史性，而历史性的核心是真实性。《大明首相》的主线是高拱执政期间只争朝夕、励精图治的历史。学者牟钟鉴评价高拱的时候说：“做学问求是，做事情求实，做人求诚，这就是高拱的真精神。”高拱执政期间秉持“相天下者无己”的理念，自律甚严，在体制性贪腐的官场堪称另类；他致力于“立规模”，是唯一一位自发调整明朝内敛、收缩的基本路线，推动国家走向改革、开放的执政大臣；他集忠诚、自律、担当于一身，是同时代任何一位执政大臣所不具备的。然而，这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却长期被埋没甚至丑化。作者正是痛心于此，因此力图通过作品还原历史，还原一个真实的高拱。无论是平息西南的“安氏之乱”，对蒙古右翼的封贡互市、任用殷正茂平定两广、任用张学颜经略辽东、处置安庆兵变，还是推进吏治、边政、司法、漕政革新，肃贪反腐等等，都是在基于史料、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令人油然而生“今日读小说，明日读历史如见故人”之感。

对历史上的人和事，不同时期、站在不同角度，难免会有不同看法。这对历史小说作家是一种考验。《大明首相》的作者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对历史事件的高超驾驭能力。比如，如何描写高拱任用殷正茂剿除割据广西古田半个多世纪的韦银豹势力？作为主政者，高拱追求行政统一，对韦银豹势力杀官劫库事件不能容忍，誓言结束割据状态，这是正当的；另一方面，韦银豹势力之所以存在，也是官逼民反的结果，具有反抗压迫性质，也是正当的。作者对这两方面都进行了客观描述。在广西布政使郭应聘约见八寨寨老时，一位寨老这样说：“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民若一反，官必来剿，就这么回事啦！”郭应聘则说：“再说这韦银豹老哥。当初他起来造反，或许是为官府所逼。可他成了气候，杀官吏、抢库银，这不是强盗所为？他盘踞古田，占山为王，不是绿林大盗？他盖官殿、养义勇，造兵器，不花钱？本官不信，他治下老百姓的日子会更好过！”这样的处理，相对中立、客观。不仅如此，作者的遣词用语也很用心，叙述性用语使用“僮人”、“僮勇”，只有在官员提到韦银豹势力时方出现“蛮贼”这样的词汇，以符合历史真实。

历史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个很大不同，是要营造历史氛围；而要营造历史氛围，就需要还原当时的历史风貌，这对作者的知识储备、文学功底是一个巨大考验。从《大明首相》开篇不久对长安街南侧各部衙门坐落格局的描写，会同馆、四夷馆、乌蛮寺等等这些名词的使用，以及兵马俑、司天监在棋盘街维持治安等表述来看，作者有扎实的历史知识，熟悉当时的制度、风俗，从而使得这部小说充盈着浓厚的历史氛围，具有历史小说的高雅格调。

历史小说传达某种可贵的历史精神，这取决于作者的历史观、价值观。学者刘大先在《必须保卫历史》一文中强调，“文学艺术需要寻找自己独特的叙述维度，创造出带有历史责任、社会担当、道德关怀、理想诉求的历史书写，进而复兴过传统的伟大遗产，成就一个全新的历史。”《大明首相》就是这样一部有着独特叙述维度的作品。写帝制时代君臣的历史小说，往往陷入圣君贤相的窠臼，传达出的历史观、价值观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大明首相》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站在大历史维度，敏锐地把握住了主人公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正是世界历史转折点这一时代背景，以大航海的时代潮流为坐标，对历史人物的施政理念、为政举措进行价值判断。小说一开篇，就以外交事件切入，以招考四夷馆译字生风波，推进到游走江湖的邵大侠建言开海禁；小说结尾处，又通过邵大侠之子之口，说出“力推开海禁、通海运、造海船、建水军，西洋诸国日渐富强，也正是实行了这些套路而已”这番点睛的话，从而把当政者的作为是不是顺应时代潮流，为内敛、封闭的明王朝寻找新出路作为判断历史人物的价值标准。当作品以这样的叙事维度展开时，不需要刻意迎合，便散发出强烈的时代

精神。这样的价值观不是小说主人公所处的时代所需要的，也是各个时代都需要的，历久而弥新。正因如此，《大明首相》这样的历史小说才经得起历史检验，才不会随着时势的变迁而失去其价值。

历史小说对人物刻画，不能超越历史的底线。在《大明首相》中，作者没有局限于叙述历史故事，也没有刻意塑造高大上的英雄，更没有为了主人公的艺术超越而有意贬低乃至丑化同时代的历史人物，而是通过多个角度，展示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作品中，读者看到的都是承担多重角色又在既定制度规制下的人，他们的一切善举、恶行，都能从人性中找到动因。对高拱这个人，小说既围绕他锐意匡时、励精图治的功绩展开，实事求是地塑造出忠诚、自律、担当的正面形象，同时也把他自负、急躁乃至粗暴的一面展露出来。对勾结太监推翻高拱的张居正，作者没有把他作为反面人物来写，而是主要描写他们之间的友谊、合作，即使在张居正与高拱的矛盾已然尖锐，作家在描写处置安庆兵变、江西安义盗贼劫库案这些关系重大的事件时，仍然是把张居正作为高拱的支持者描述的；而涉及张居正勾结太监冯保以阴谋手段推翻高拱，甚至以王大臣闯宫事件假造假案谋杀高氏家族的事件，也没有贬损张居正，字里行间，从政见、人性角度，表现出对张居正一定程度的理解、谅解。这里既有张居正的性格、家庭等问题，又有普遍存在于国人心目中的“面子”问题，使得他决计勾结太监冯保推翻生死之交高拱这件事，看起来也有符合人情世道的一面。此后，张居正和高拱继续保持密切联系，他特意到新郑探视下野6年的高拱的场景，令人泪目。即使是太监冯保、汉奸赵全，作者也没有丑化他们。比如，当冯保看到京城市民为故去的父祖上坟祭奠的场面而伤感时，读者对身为太监的冯保会不会陡然生出几分同情？再比如，对汉奸赵全的描写，有这样两个场景：

赵全似乎早有预感，他没有挣扎，只是痛心。他仰头看着俺答汗，平静地说：“汗爷，小的侍奉汗爷多年……我孝顺汗爷可谓至矣！今乃为一个孩子，将我捆绑而卖，不如高草！”当赵全被押到大同云石堡时：副总兵麻锦会同通事官鲍崇德上前交接，麻锦问：“赵全，回到故土，有何要说的？”赵全面无惧色，不服气地说：“我到胡地不过数载，建成板升城，繁华不亚于此地……”麻锦是武官，自知说不过赵全，向他“呸”了一口：“这片土地，快被血染红了！都是我大明子民的血！冤魂何止千万，他们要向你索命！”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把握，注重的是对人物内心的挖掘，而不是简单地非黑即白的褒贬。高拱的清明刚健、张居正的深有城府、王世贞的意气用事、俺答汗的豪气、冯保的狡黠、张四维的精明、李贵妃的功利……一个个具有鲜明性格、具有立体感的人物跃然纸上，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具有艺术感染力。

《八步沙》： 脱贫攻坚领域里的特殊战场

□陈玉福

2018年底的一天，甘肃省政协一位秘书长希望我写一部脱贫攻坚奔小康的大作品。我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个信息，甘肃省政协主席欧阳坚先生在甘肃省西和县的脱贫攻坚战场上，给西和县的父老乡亲们出主意想办法，让这个甘肃省倒数后三位的贫困县逐步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就在我准备接受任务奔赴西和采访的时候，凉州大马研究院的院长希望我去古浪县八步沙采访，希望我创作出一部反映八步沙从沙漠到绿洲的电影剧本来。于是我查阅了有关八步沙的资料。这时候，我有了新思路：如果西和县是甘肃省脱贫攻坚正面战场的话，那么八步沙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的特殊战场。这个特殊战场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反映的不仅仅是脱贫攻坚的内容，而且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的主要内容。

翌日，我一个猛子扎进了八步沙，对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近半个世纪治沙梦的实现，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采访，这才有了电影剧本《八步沙》（《中国作家》2019年第四期）和长篇小说《八步沙》（敦煌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版）。我去采访八步沙的时候，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对八步沙先进集体表彰决定刚刚下来；我的电影剧本以《中国作家》头条发表的时候，中宣部、国家林草局的考察组来到了八步沙；长篇小说《八步沙》交给出版社编辑的时候，中宣部正式授予八步沙林场优秀群体“时代楷模”称号。

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一个当代的传奇。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数十万亩荒漠变成了绿洲。“六老汉”和他们的后人，先后治理荒漠近40万亩，形成了一条防风固沙绿色屏障，让风沙线倒退15公里，有效地遏制了沙进人退的被动局面，确保了当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态安全。他们凝聚的精神脊梁，撑起了八步沙的一片晴空，书写了一段悲壮、豪迈、可歌可泣的故事……根据联合国权威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在植树造林方面的成绩堪称世界第一。全球从2000年到2018年新增的绿化面积中，25%以上来自中国，中国对全球绿化增量的贡献位居全球首位，已经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贡献者和引领者。

我在创作长篇小说《八步沙》的时候，首先意识到，八步沙的治沙造林工作，就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的具体行动。同时我认为，八步沙的治沙造林战场，还是脱贫攻坚奔小康的特殊战场。有了这样的“先人为主”，我就有意识地把八步沙人如何在不适于人类生存的地域创造人间奇迹的创造性劳动视为脱贫攻坚奔小康的工作。事实上也是如此，如今，八步沙人不仅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还带领周边的人们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八步沙人创业的日子里，他们虽然没有这种意识，但他们已经有意无意地在脱贫攻坚奔小康的道路上努力很久了。

脱贫攻坚工作被甘肃省的领导称之为“战场”，这就说明脱贫攻坚对于甘肃的重要性。而实际上，脱贫攻坚工作不仅在甘肃，在全国也是当下正在进行的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不仅如此，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有一个“千年计划”，其中不少内容跟我们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是一致的。联合国认为，中国的脱贫攻坚计划，是世界脱贫攻坚计划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中国脱贫攻坚工作为世界是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的。而作家要发现这个“极大的贡献”，你光蹲在象牙塔里是不行的。所以，中国作家协会每年都在搞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工作，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作家们发现这些你平日想不出的生活。我是第一个以专业作家身份进入八步沙的，这正是一个创作者正确的状态。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你看到的仅仅是局部，不代表全部。我觉得，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尤其是一个作家所采访的生活也应该是有限的。可是，我们在这个“有限”里发现了八步沙，发现了郭万刚这个群体。我觉得我的这个发现比我的创作本身更有意义。如果2018年我没有到八步沙采访，也许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感动”，那就更没有电影剧本和长篇小说《八步沙》了。一句话，我创作的这个《八步沙》应该是对生活产生的激情，也可以说是冲动。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生活，没有冲动，没有激情，那他的创作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出自白居易写给好友元稹的《与元九书》。晚唐张为著有《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诗人按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分为六类，其中白居易被列为第一类诗人之首。他对白居易的这一评判无疑是非常有道理的。白居易获得这样的称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坚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这一原则回应了当时文艺创作遇到的挑战，因其注重发挥文艺的基本功能，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获得后世广泛的共鸣，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都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这样的创作观念，正是对传统文艺精神的继承和升华。当前适逢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新时代，国家空前富强，人民生活丰富多彩，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和中国力量为文学艺术家施展才华提供了无限可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应该被发扬光大，并被赋予与新时代相应的新内涵。

我们对照古代诗人白居易的创作精神，再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要求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的。首先，我们对现实生活的热情是不够的。只要你对现实生活有热情，有体验，相信是能够创作出优秀作品来的。体验生活、学习人民，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那就是社会实践。我们的文学实践了，再加上理论上的认知，我们的创作如何与现实生活接轨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开始，我接受省政协那位官员的邀请时，我还没来得及对正在进行的这场“脱贫攻坚战”进行学习和研究，所以我对其没有足够的认识，故简单地认为这应该是甘肃省乃至我国政府当下的一种短期行为。这样的工作，只要风头一过，就过去了，就偃旗息鼓了。可是，长篇小说《八步沙》出版后，我对脱贫攻坚奔小康的看法有所改变。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要想改变一种现状、一种旧观念，首要的问题是解决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我们通过共同富裕得来的繁荣才是真正的繁荣；我们通过个体的梦想为中国梦的实现做出贡献且让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强大，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大，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强大。

长篇小说《八步沙》的创作，让我有了这样的认知，让我真正明白了一个文学创作者如何重视现实生活以及现实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感谢现实，感谢八步沙和这块土地上的创业者。

